

高研院联盟通讯（2017 年）



一、院情侦测

1、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2017 年 4 月 20 日，院长王宁教授作为唯一的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应邀出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主题为“跨越时空的交响：中英文学对话”特别活动，并作了题为“中英文学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主题演讲。

5 月 26-29 日，王宁教授出席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举办的“上海论坛”，并在高端圆桌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全球现代性与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建构”的专题演讲，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亚洲与世界：新动力、新格局、新秩序”。

7 月 12-13 日，全在国 2017 宝洁“领袖星高度”群英汇暑期领导力训练营活动中，我院新闻传播专业 2015 级硕士周海琼在葛岩导师的指导下，荣获商业精英线全国优秀团队第一名。

7 月 14-17 日，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与国际权威刊物《今日德里达》(*Derrida Today*)合作在徐汇校区举办了“德里达与中国：走向全球人文的建构”国际研讨会。

在 8 月 17-20 日在古城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 12 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院王宁教授当选为新一届会长。

9 月 21-25 日，我院副院长徐剑教授，詹仁左教授，王琦副研究员一行前往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的日本女子美术大学，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女子美术大学第 7 次中日国际交流书画展，并在日本女子美术大学进行教学活动。

9 月，王宁教授应邀为著名哲学社会科学权威刊物《目的》(*Telos*)最近一期 (No. 180, Fall 2017) 主编的专辑《世界主义与中国》(*Cosmopolitanism and China*) 出版，并在欧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被认为是用西方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的一个成功典范。

2、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7 年，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积极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举办高端学术讲座“珞珈讲坛”23 场、“长江论坛”29 场、“珞珈青年跨学科论坛”3 期，营造了砥砺思想、交流学术的浓郁氛围。

6 月 16 日，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首届文科院长论坛，与会文科院系机构负责人交流办院治学理念，分析文科发展策略，谋划文科发展蓝图，围绕新形势下如何实现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持续繁荣等问题深入交流。

7 月，我校发布 2016 年版《武汉大学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报告》《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析报告》。三份报告由图书馆、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联合编制，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了我校学科发展态势、学科竞争力水平和高水平论文分布。

11 月 29 日，《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制度实施办法》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印发实施。校内驻院研究员的聘请，以已退休的校内知名专家为主，要求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学术声誉，并取得较大学术成就。校外选聘驻院研究员，结合学校文科团队建设与科研创新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聘请。驻院研究员驻院期间以学术研究为主。

12 月 9 日，武汉大学 2017 年首届珞珈智库论坛举行，来自学界、实业界、

金融界、智库机构的智库专家齐聚珞珈山，围绕“新时代、新理念、新体系”的论坛主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3、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2017年6月14日，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飏教授应邀参加“寻找正确的平衡：国际大学高等研究院联盟成员会议”，并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运作模式等内容发表了主题演讲。这是浙大高研院首次参与国际高研院联盟会议，代表着高研院的声誉在国际上获得认可。

7月7日，浙大高研院与浙大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并举行了签约仪式。出版社社长鲁东明、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飏代表双方签约，并分别发表致辞。

9月24日，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罗卫东教授组织策划了“亚当·斯密的启蒙世界：亚当·斯密研习营”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深化中文世界对亚当·斯密思想的理解，培养相关研究人才。这也是大陆高校第一次围绕经典文本研读而进行的集中研习，是一次十分有益的成功尝试。

10月14日，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二周年纪念活动在浙大之江校区小礼堂举行。高研院历届驻访学者和浙大各职能部门领导共同参加了当日上午举行的通识教育主题讨论与下午的“‘数字人文’：方法与反思”和“质性社科：定性研究的争论”两场学术论坛。

10月15日，高研院学术委员会2017年第二次会议在之江校区4号楼304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浙大高研院在每年暑期增设研究坊项目的决定。

2017年，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117讲、第123讲分别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紫金港校区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定宜庄研究员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鲁西奇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对19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反思——以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例》和《史前聚落形态及其演变》的报告。这是高研院首次在浙大其它校区举办学术报告会。

4、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7年初，经过学校学科建设处反复调研和学校有关会议讨论，推出了《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了高研院的建设目标：自成立之日起，用5-10年时间，使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高地，并带动学校若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学校决定，聘任学校党委书记甘晖研究员为高研院名誉院长，李继凯教授为高研院首任院长，葛承雍教授为高研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目前已聘请校外特聘研究员18人。

11月6日，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揭牌仪式暨人文学科建设高端论坛”在长安校区召开。

11月-12月，陕西师范大学“上林人文社科讲坛”开讲，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勇主讲“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意义”，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部主任王兆胜主讲“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和创新性问题”。

2017年，高研院协办“中华文化自信与长安文化传播”国际学术讨论会、举办第八届两岸（三地）历史文化研习营筹备会，邀请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明珂、副所长王鸿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孝悌参会。

2017年，高研院创办了学术辑刊《人类学前沿》，第一辑《文学人类学》专刊即将编辑出版。

5、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7年3月11日，“北大文研读书”举行第一期活动，主题为“洪子诚教授新著《材料与注释》研讨会”。

3月14日，文研院邀请访问学者报告会在二院111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童岭发表题为“贞观年间唐帝国的东亚情报、知识与佚籍——旧抄本《翰苑》注引《高丽记》研究”的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

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及文研院第二期访问教授高曼士、许宏，访问学者李霖、吕博、张瀚墨、袁一丹等参加会议并进行讨论。

3月17日，“数字人文研究技能与方法”读书会在二院201室举行。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院徐力恒先生领读，本课程将为期一个学期。

3月18日，由北京大学文学部、国际合作部、国际批判理论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年度冬季研讨班”（青年学者工作坊）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纽约大学Todd Foley教授、清华大学谢俊教授、北大中文系贺桂梅教授、东京大学表象文化系武田将明教授参加并进行讨论。

4月14日，“静园雅集”第9期“贝克特的目光：后现代戏剧漫谈”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中国国家话剧院研究员颜榴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活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周锡瑞教授、UCLA中美合作考古班叶娃出席了此次活动。

4月15日，由北大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合办的“菊生学术工作坊”第三期“政教相维——近代中国的制度因革与文教转型”在二院208室召开。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致辞。本次活动为期两天。

5月4日，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在“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双一流’建设推进交流会”上代表文研院做了题为“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主题讲述。

6月9日，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二期“《红楼梦》中的物质文化”在北大二体地下报告厅B102举行。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黄一农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

6月28日，历史社会学读书会在静园二院111举行，该系列读书会由文研院一期访问学者罗祎楠发起，首次活动阅读的文本为伊凡厄尔马考夫（Ivan Ermakoff）的《排除自我：关于集体弃权的理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二期访问学者徐晓宏出席了而本次读书会。

9月20日，为庆祝文研院成立一周年，“文研周年”系列活动隆重举行。来自校内外的二百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活动贯穿全天，由文研周年、主题学术报告及学术论坛三部分组成。

11月3日，文研院承办第十四届北京论坛的“历史和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分论坛，涵括“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理论与方法”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内容与过程”两场学术交流会，来自海内外的18位学者应邀作学术报告。

11月7日，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院长于贝尔·博斯特(Hubert Bost)一行到访文研院并进行调研，与北京大学相关院系学者就 Scriptia 项目的合作可能性与研究路径进行交流。

6、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7年3月，北航“践行经典通识之道 感悟中华文明之美——北航知行文科试验班‘文化游学’实践项目探索”获评“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项目。该班是学校工科、理科、文科、中外合作等四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重点试验区之一。“文化游学”是高研院系统设计和精心实施的实践教学创新项目，2014年以来，已组织完成三届游学实践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4月，在北航2017年招生就业工作会上，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因在2016届本科生升学、就业等工作方面的优异表现，荣获2015-2016年度“高质量留学奖”、2015-2016年度“就业工作先进学院”两项集体荣誉。2016届毕业生中，27名学生赴北大、清华、伦敦政经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海内外著名高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2名学生就业，就业率达到100%。

6月，北航高研院学术集刊《文化传播》2017年第1期（总第1期）出版。本期共收入文章18篇，作者大多系海内外高校或研究机构长期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知名专家或中青年学者，他们的论述聚焦中西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建设新视野、大格局，兼具学术取向和现实取向，对于促进文化传播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

10月25日上午，2016级知行文科试验班“顾人有道”系列交流活动第一讲

在沙河校区专用教室 J1-210 顺利举行。此次系列活动由试验班班主任段颀老师主持开展，旨在向同学们拓展经济学相关领域的知识，为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答疑解惑。

10 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7 年度驻校艺术家计划正式启动。本届北航驻校艺术家计划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书法艺术，由北航高研院/文化与艺术传播研究院组织实施，邀请著名书法家翟德年入驻沙河校区，为学生讲授中国书法赏析与创作。作为北航高研院/文化与艺术传播研究院主持的校级“艺文赏析与体验”实践教学示范平台及试点项目，北航“驻校艺术家/作家计划”自 2013 年启动以来，已率先在全国高校完整实施了“中国山水画赏析与创作”、“中华诗词赏析与创作”、“中国花鸟画赏析与创作”等三届。

11 月 1 日上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高研学术坊召开大类核心通识课建设专题研讨会。北航学院常务副院长曹庆华，高研院院长蔡劲松、直属党支部书记于金龙，高研院《中国文明文化史》、《中国经典研读》、《西方文明文化史》、《西方经典研读》等 4 门核心通识课程全体任课教师等出席研讨会。

11 月 15 日下午，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邀，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美术学院周思中教授做客“北航高研论坛”，以“文化、技术与资源：中国瓷器制造模式的世界化”为题，在高研学术坊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

11 月 30 日，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高研学术坊召开“高研沙龙”研讨会，高研院李昊副教授以“德国法学教育的近距离观察”为题作了精彩报告。12 月 2 日晚，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思想文化节系列活动“当孔子遇上柏拉图”主题沙龙在沙河校区知行文科试验班专用教室 J1-210 顺利举行。本次交流会由高研院田飞龙老师和李静老师主讲，2016 级知行文科试验班班主任段颀老师主持，讨论了中西方思想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12 月 6 日下午，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高研学术坊举办学术沙龙，顾家宁老师以《通专结合与个性化发展——达特茅斯学院的本科通识教育及其启示》为题为师生作精彩报告。

7、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2017年1月5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推广部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的图书推介网络微刊“ECNU 人文大书架”No.1 推出。该刊邀请本校和外校的著名专家推介图书，以“每周一书”的形式持续推进，适当穿插若干“专刊”，充分发挥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的优势，注重青年一代学人的直接参与，以跟踪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前沿信息。

2月24日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老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带来题为“后革命时代的幽灵种种”的精彩演讲。本次演讲由中文系教授罗岗老师主持，来自校内外的众多师生齐聚现场，盛况空前。

4月2日，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7年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贺萧（Gail Hershatter）到访，为期一个月。其间开设《中国现代史中的女性》海外专家课程，面向全校研究生开放选修。

4月20日上午，“第四届思勉人文思想节：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隆重开幕。首场活动以“诗书弘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为题，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东方卫视中心共同主办。

5月12日上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第十四次研究员评议会召开，就2017年青年研究员招聘、在院青年研究员年度学术考核进行审议、表决。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王家范、杨国强、张济顺、许纪霖、杨奎松、严佐之、刘永翔、童世骏、谭帆出席，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方媛、副院长方笑一列席。经审议，许可、杨洋、赵思渊等3人被聘为青年研究员。

5月22-24日，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兼院长谭帆、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方媛、办公室主任于明静、研究生工作秘书肖连奇一行，赴日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就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教师与研究生互派、图书资料建设等事宜，展开友好交流。

10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7年讲座教授、牛津大学东方系（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何鸿燊中国历史讲座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到访，为期一个月。期间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英文档案》海外专家课程，面向全校研究生开放选修。10月9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7年讲座教授、牛津大学东方系何鸿燊中国历史讲座教授沈艾娣

到访，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英文档案》海外专家课程，为期1个月。10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7年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明辉到访，开设《儒家与康德》海外专家课程，为期1个月。

11月18日，“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十周年暨第三届中国高校高研院联盟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重庆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高研院的代表、专家学者，以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与会，并出席吕思勉先生铜像揭幕仪式。

8、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上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7年度主题“转型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第一次研讨会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本次活动由高研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苏建教授主持。6月29日（星期四）上午该主题的第二次研讨会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高研院副院长、当代中心副主任孙国东副教授主持了此次活动。

4月，英国知识共享网站（the Culture Trip）将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著名西方哲学学者顾肃教授，与当代世界哲学界的翘楚并列为“十大值得阅读的当代哲学家”。他们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对人类思想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其他九位哲学家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亚）、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美国）、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美国）、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美国）、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印度）、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美国）、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澳大利亚）、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南非）。

6月2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管中闵教授访问我院。高研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苏建博士与我院副院长、专职研究人员孙国东副教授会见了管中闵教授。郭苏建院长介绍

了我院的发展历程、学术定位和办院模式。他着重介绍了我院的“年度主题”跨学科研究的组织方式，即我院如何整合本院专职研究人员、校内其他院系师资和国际高端访问学者三方共同参与、学术交流、成果出版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等，并介绍了我院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和未来的发展规划。会谈中，管中闵院长也介绍了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相关情况。双方决定开展机构合作，并就长效合作方式等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

6月1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示了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名单。根据公示名单，由我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当代政治哲学平等正义理论研究》与我院副院长孙国东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研究》，同时获准立项。

11月28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副主编林曦副教授赴北京参加由全球第二大出版商Springer举办的2017年中国合作期刊研讨会，与会编辑来自国内100多家Springer合作期刊。在此次研讨会上，Springer Nature的专家以及来自科睿唯安和COPE的专家，就期刊出版的各个不同环节，和与会编辑们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9、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从3月30日到6月20日期间，南京大学-伯明翰大学-凤凰出版集团莎士比亚(中国)中心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中心先后邀请了濑户宏、Stanley E. Gontarski、Wolfgang G. Müller、张冲、杨林贵、郝田虎等多位知名学者来中心访问，并举行了近十场与莎士比亚研究、戏剧表演与改编等相关的专题学术讲座。与此同时，我校从事莎士比亚研究的学者丛丛教授、张瑛副教授、陈星博士等也举行讲座，介绍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的最新进展，受到热烈欢迎。

4月，《中国教育报》刊登特稿专文介绍我院的本科生驻院研修项目。该文以“一场跨学科的理想主义实验”为题，并突出强调了“驻院生活”的特点是“跨专业选拔、没有验收、没有考核”。该文紧紧抓住了本项目的核心，是以高研院这个跨学科研究平台和致力于倡导素质教育和本科教育创新的教务处在本科生学术能力培养上的强强联合与体制创新。文章指出，大学的本源在于其是师生共同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因此，一方面努力去除大学教育中的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拉近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这才是培养未来大学生的方向。

5月至7月期间，应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邀请，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亚洲研究系师生13人来我校开展访问交流活动，本次活动是高研院与宾大亚洲研究系合租开展的“*The Globally Engaged Humanities*”项目的重要内容。该校历史系Grogrey Smits教授于5月7日来南京大学开设了“东亚科技史(*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短期课程，围绕16-18世纪以来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的科技、医疗、地质、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展开描绘和讨论。此外，宾州州立大学博士生邓国亮来校访问，并参加了我院的多项活动。

5月15日至6月8日，国际著名地理学家、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杰出教授、南京大学“薛君度讲座教授”大卫·哈维来我校工作。在此期间，他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设了主题为“*Accumul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pace*”的短期课程，参加了主题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BITAT 40 Years: Global Transformation & China Reform of Urban & Territorial Planning*”的学术会议并做大会发言。5月24日，哈维教授还在仙林校区做了一场主题为“*Visualizing Capital*”的名家讲坛演讲。6月2日至30日，著名哲学家、法国蓬皮杜国际艺术中心发展部主任、南京大学“薛君度讲座教授”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来我校开设短期课程。本次授课共分8讲，主要内容围绕古希腊哲学展开，涉及如何阅读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精神、悲剧与戏剧以及普罗泰戈拉斯和安提戈尔的阅读等众多主题。

6月13日上午，“中国与欧洲犹太人的跨民族相遇”工作坊由南京大学哲学系犹太-以色列研究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犹太研究项目和南京大学高研院联合举办，国内外11位学者出席。工作坊旨在通过学术信息的交流以及对该领域最新学术进展的讨论，为2018年6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北京中心举办的一场同名国际学术会议做前期准备。工作坊由南京大学徐新教授主持，工作语言为英语。

6月18-20日，由南京大学高研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合作项目共同举办的“全球性别研究工作坊”及“跨国性别与媒体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仙林校区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社科院、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众多知名学者20余人，与南京大学相关院系的学者一起对“全球性别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2017年7月17日至24日，“回顾大规模暴力和探索亚洲与欧洲的和解道路”暑期研修班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高研院报告厅举行。本期暑期研修班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荷兰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院(NIOD)、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等机构联合举办。暑期班为期7天，4位荷方与4位中方教授共同为学员授课。活动期间，学员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总统府、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等多个历史记忆场地。

11月28日至12月1日，高研院副院长从从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高研院参加主题为“当今高研院的挑战与未来展望”的世界高校高研院联盟(UBIAS)2017年会，并做大会发言。在发言中，从从教授主要介绍了南大高研院的跨学科研究、青年教师培养以及国内高校高研院联盟的情况。

12月，应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IHS)的邀请，南京大学高研院特委派哲学系徐新教授、商学院卜茂亮副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做短期交流。本次活动为南京大学高研院与台湾大学高研院之间双边学术交流活动的组成部分。自2006年两院签订学术合作协议以来，已有超过30位两校学者实现了互访，有力地推动了两校间的学术交流工作。

10、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7年2月，重庆市社科联对2016年度全市社科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通报表扬，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被评为“2016年度重庆市社科普及基地工作先进单位”。目前我市共有社科普及基地50个，本次获评的社科普及基地工作先进单位共10个，我校社科普及基地首次获得该荣誉称号。

为了提高高研院研究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高研院研究生会于3月31日晚上7点，在重庆大学三食堂柏树林餐厅举办了本学期第一次英语角活动。本次英语角的主题是“茶与美食的文化之旅”。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美国、俄罗斯、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等国的25名留学生以及15名中国学生参加。

4月至6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歌研究员来我校高研院担任资深访问学者。孙歌研究员多年来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驻院期间，除讲授校外专家课程及进行公开讲座外，同时将指导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及政经法研究中心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参与各中心组织的相关学术活动。

5月6日，高研院“国初”（共和国初期）读书会在文字斋会议室举办了主题为“苏联经济核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的学术午餐会。应高研院学术副院长李放春之邀，此次午餐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超超主讲，并有来自高研院政经法研究中心、史学研究中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十余名教师参与。

5月6日下午3:00-6:30，“国初”读书会在高研院文字斋学术报告厅举行了第二次共和国研究微型工作坊。本次活动由高研院学术副院长、“百人学者”李放春研究员主持，高研院邹羽教授、青年教师张华对各自研究成果进行汇报，并由高研院政经法中心陈颀副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林超超分别进行评议。此外，还有来自高研院政经法研究中心、史学研究中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十余名青年教师及部分研究生、本科生积极参与。

11月3日下午，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宗益到我院进行工作调研，副院长姚飞（主持工作）、李东、李放春，院党委副书记胡佳，教师代表唐杰以及部分行政管理人员参与了调研会。

12月30日下午，重庆大学人高研院共和国研究中心第二次内部学术沙龙在文字斋小会议室顺利举行。此次沙龙围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由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师金浪导读。来自政经法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中心、史学研究中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十余名教师参加了此次沙龙活动。

（说明：本讯息的院所排列以收稿时间为序，内容来源于各高研院联络员提供的信息，部分取自于相关高研院网站，在此对大家深表感谢。欢迎各院积极投稿，提供各种活动信息。）

二、华山论道

论题：高研院的宗旨、模式与道路

1、南京大学高研院院长 周 宪 教授

成立高研院联盟的初衷，就是为了大家聊一聊，交流一下，中国高校现在也是百花齐放的，下面怎么走也希望各位来发表高见，看看具体下一步怎么做。我自己作为南京大学高研院的院长，有一些经验，可供各位参考。

第一，现在“智库研究”变成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学校有很多机构、院系、研究所都想往智库转，因为在考核的评级里面，如果提交的咨询报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将会得到非常重的礼遇，就会获得很高的评价，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但我想说的是，高研院作为一个机制，是不是一股脑地都转成智库型研究？我想不一定。我认为，高研院作为一个在院系之外的科研机构，它能提供一些院系之外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在个人兴趣自由探索和智库形成团队研究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高研院都变成了智库型的，那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我对此并不反对，但是长此以往，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会面临危机，我们作为高研院的一个行政的负责人，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特别提出来高研院怎么在目前的形势下能够成为高校教师的一个避风港。

南京大学高研院创立时，我特别参考了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行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些做法，根据我对他们一些成功经验的理解，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时间、空间和自由”，让他们在这里有时间、有空间在这样一个高度制度化和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能够暂时摆脱出来，我们当时设计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并不是要搞一个什么智库。十多年来，虽然我作为院长，我也不断受到学校高层领导的压力，但是我想我最大的回报就是在我们高研院 60 多位学者他们自己觉得在高研院他们的学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另外他们自己结识了不同其他院系的学者，他们组成了一些研究的小组，而且个人的学术有很大的进步，这是我感到比较欣慰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管理型”与“学术型”的分类，我想我们南京大学

应该是学术型。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顶住了一些压力，我觉得从长此以往对学校教师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选的都是从青年教师中间遴选的。今天的高校中，工具理性已经变成我们学术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导向，价值理性现在几乎很少去谈论了，所以我认为在高研院的问题上重提价值理性，可能对高研院未来的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如何破解跨学科的研究难题？我觉得跨学科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是“课题选择和设计”，搞一个什么样的课题比较合适？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高研院做了很多尝试和探索，尤其是把大家团起来的一个前提及时成员们要对这个课题要有兴趣。这个里面困难往往来自于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学术上的兴趣点和学科差异，其二就是老师们自身头脑中的工具理性在作怪。他们往往禁不住去掂量：为什么要参加这么一个会议？对我有什么好处？经常先想的不是我在这个学科和这个团队中做了什么贡献，而是先想我能得到什么回报。所以，从行政的角度来看，组织跨学科是一件很难实施，也难以见效的事。在学校资源分配难以达到绝对公平的情况下，怎么让每一个参与跨学科研究的老师能够在这里获得成长，获得资源，获得回报，我觉得是每一位领导者所要考虑的事。

其次，跨学科研究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领袖。这个领袖人才也确实难寻，学术做的好的不一定有组织能力，不一定有号召力，有号召力的人可能他自己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弱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南京大学努力摸索的工作，首先是要选一个比较好的学术领袖来做这个事，但这个事确实是比较难做。

我们在跨学科研究上大概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或者说探索过三种模式，第一种应该叫“多学科”，我把它概括为“多学科互动的清谈模式”，我认为高校清谈是非常重要的，是出思想、出智慧的地方，大家彼此的大脑通过互相激励很重要。而且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我们的很多课题都是在清谈里发现灵感的。当然清谈也要重视选题和过程把控，我们有一个比较好方式就是工作午餐，每次一个人报告，然后大家讨论，争论的非常激烈，常常是没办法收场，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学科里面怎么鼓励学者走出自己的学科，而且我们工作午餐是开放的，对学校的老师和其他的学生都是开放的，所以经常各个院系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听。但是这个问题主要是他没有形成学科上的交叉，只是不同的学科参加了一个不同的讨论，他们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整合的研究。

第二种是我们组织一些团队，搞一些跨学科具体的题目，有的拿到好几个国家重大课题，在高研院配套的我们也继续这方面的发展。现在我觉得跨学科研究英文里面有好多词了，比如说现在常用的 multi-platform，还有 inter-disciplinary，它都是讲的不同情况。根据我的研究，跨学科最好的是能够形成一个团队，大家在这个团队里面都有所贡献，就是你的学科对这个项目的贡献，但如何来评价

这些成果和贡献，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第三种模式是我自己比较主张的一个模式，即“个人的跨学科模式”，也就是我从罗兰·巴特那里得到的一个说法和启发。罗兰·巴特说，“真正的跨学科不是在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学者身上发生的，他用了不同学科的东西”。这是罗兰·巴特很经典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高研院根据每个老师具体情况会提出一些要求，会帮助他们组织邀请它所需要其他的学科的学者来参与，这种以个人的学术研究为重心、组织了一些小型的群体的做法会取得一些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好的效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当然，跨学科研究将讲来讲去仍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其中比较难的一块就是国际化的问题。我们要请国际上的学者，当然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博士后学者，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经费支持的问题，因为很多学校都规定的校内的经费不支持校外学者的使用，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成为一个现实的制约因素。国际化是一个必由之路，只有实现了国际化，这样的高研院才能真正的做成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2、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渠敬东 教授

我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才成立不久，所以我想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交流，但是我们可以交流一些想法。在我们文研院成立的过程里边，其实也汲取了很多国内、国外的高研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对我们来讲帮助也是很大。

第一，高研院或者是文研院这样的机构并不是因为美国有，我们才要有。因为其实任何一种研究机构都属于应时势所趋，应学术发展的问题所趋而成立的。所以，我们要成立高研院这样的组织机构其实在某些意义上并不是模仿来的，而是我们的学术发展、国家发展以及整个全球世界的变化而倒逼出来的一种机构，这是我们北大文研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

有这个认识，我想无论是北大的领导还是我们院长，实际上都很清楚高研院这样的机构不是智库，不是课题制，也不是应用研究。林校长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北大的研究院要做的事情就是基础研究。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基础研究？我想这些年来，我们现在学术发展的情况和态势，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础研究已经不是基础研究了。什么意思？我们的学者，我们学生在不断的有这种积分的制度，学者不断的有考评的制度，整个国家也追求大学课题，使得我们每个学者都按照课题、发表文章以及技术的方式去理解我们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哲学也不

是基础研究。

但是，如果看中国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说我们对整个世界迈进、我们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以及当下的现实了解得还不够充分，所以这就形成了两个非常滑稽的局面：一方面，我们的学者队伍在不断的发展，像摊大饼一样；另外一方面，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它的历史，我们中国真正复杂变化的当下以及我们和历史之间的传统的关联，却越来越失去学者们的关注。我们知道今天欧洲也陷入到各种危机里，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几乎没有对于这些大面积的全世界的各个范围的地方有扎实的兴趣，更何况我们对他们的基础、对他们的历史经验，这些年来不是越来越强了，而是越来越弱了。换句话说，即使是我们用了这种方式去研究，我们整个的学术体制都要求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不是我们自身构造的，而是现有的西方的话语里去做这样的讨论。如果长此以往，我觉得学问对国家、对文明所承担的任务将会逐渐流失。

所以我想，高研院的机制应该是倒逼出来的，就是在现在非常奇怪的局面下和整个世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态势里，必须中国要给出一些积累和回应。高研院应该倡导跨学科研究，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表象。比如说前几个月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我们正是因为对土耳其整个的宗教和历史有一种非常好的研究，才能对这个政变的形势作出非常准确的判断，而不是利用国际政治的利益交换格局里的调查数据。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对于现实历史的、经典的、整个文明的基础研究才是高研院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是中国高研院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知道了高研院该往哪个方向走。在很多人看来，表面上我们有很多讲座、研讨，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骨子里我们还是要凝聚对于中国这个文明系统里面，特别是在全球视野中哪些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各个学科共同在一起能够处理的？哪些学科、哪些问题是必须很多的学科能够在一起才能积累，不断的继承和积累而达到效果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认为首先高研院的体制不是常规的体制，不是今天用各种数量、指标考核的体制，它是一个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地方。

涵育学术和激活思想首先要对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思想做一个很好的理解。我们越来越觉得对于中国整个文明系统的研究，可能早期文明的构造，也就是说如何形成中国的概念，并实现了早期这个中国形态文明结构，这是一个我们文研院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是北大还是其他的地方，我们长期有很好的积累，考古学院，特别是商周或者是再往上的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中国哲学，甚至是人类学以及像马克思、涂尔干这样对于早期人类文明所探索的一些解释。所以我们是想对于文明存在的基本机制，如果不做了解，今天即使对当代社会做多少判断都是没有真正的根基。

第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是“多元一体”的国家，这一点和西方从中世纪以及封建制度后叶，是有着不完全一样的历史过程。所以如何探讨中国从中古时期以来，民族如何融合凝聚，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怎么样确立一个秩序？这也是我们围绕着中国历史和基本的问题，以及和现代很多社会科学院融合的一个很好的问题。政治和民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我们讨论的焦点，只要好好的循序渐进的做积累和讨论，那么一定会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下中国政治危机有好处的，也对理解中国政治本身的要义是有好处的。

同样，中国历朝历代都面临着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从近代以来，社会转型必定要以前后左右的文化和思想为转移，所以我们也想在这些意义上融入比较多的社会科学家以及和在历史学院、文字学院、交通史以及各个方面的学者能够好好的检讨、探讨一下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型问题的实质，以及它们的关联在哪里。我说这些都不是能用课题解决的大问题——课题都是学者自己负责，但是学者同样走出自己专业性狭窄的范围，而进入到一个好的平台得到涵育，才是今天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我们想重新看一下西方，重新在一个文明和正视历史的架构里面去研究，我们今天要突破纯粹的“东西问题”而进入到一个对整个世界的多文明形态的研究，这都是我想北京大学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它在一百年多的历史里面一直在承担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的文研院必须要有自己的机遇，我们的想法其实就是六个字，“近者悦，远者来”，由于北大有着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能把所谓的“国际化”当成目标，而必须把国际化当成工具、当成我们的手段。我们请来很多国外的知名学者，但是他们必须要凝聚成为我们北京大学要发育出的学术形态，必须要做以北京大学、以我们中国的思想和研究作为本位才能做到的那些事情。否则，一切的国际化都不过是竹篮打水。所以，如何凝聚中国目前的学术，并且在一个长期的整个世界的多个架构里面去充分的理解，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面临着的当下处境和历史传承。

我想我们文研院的主要工作有两个部分，一是请人来，一个是要好好的为北京大学的学者服务，所以，服务学者、服务学科、服务学术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些相遇，比如说在文研院需要以中文为核心而进行交流，因为我们必须要用中文，这种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和感同身受的，我们能够有这种真正在身体和身心几方面都涵育我们自身的思想的这种文字，因为一种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这种感知世界的方法，我们即使把国外学者请来了，他懂中文就用中文讲，如果不懂中文一定要翻译，为什么？一切都是在于四个字，“守正出新”，不守着我们自身的传统和我们自身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新的知识生发和生长。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也是美好的探索工作，但是必须做，

中国的高研院必须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高研院，其他国家的高研院也是嵌入在各自的文明和发展过程而成立而发挥作用的机构。

（说明：本栏目内容取材于 2016 年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高研院联盟会议代表的发言，此后将陆续发布其他各院学者关于高研院宗旨、模式与道路的观点、意见和讨论，也欢迎各院积极投稿，发表观点。）

三、匠心独运

人文学科的“虚”与“实”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 王 宁

大学文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剑桥大学，除了耀眼的学术大师光环外，另一个颇能引起师生自豪的就是大学的精神。



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要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且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人文学者的观点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对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对人文学科的成果评价必须是定量和定性的结合。平庸的导师依赖聪明的学生帮助自己出成果，优秀的导师则能把一个本来没有什么成果的学生培养成著述甚丰的学术新秀。

“人文”具有双重意义

毫无疑问，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大学的文化建设将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剑桥大学，除了那些耀眼的学术大师光环外，另一个颇能引起师生自豪的就是大学的精神，或者说大学的文化氛围，生活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促使你感到一种积极向上蓬勃进取的动力。所以在这些世界一流大学里，尽管人文学科貌似“虚名”，并没有任何定量的考核，但是教师们都感觉到，如果不出成果就是对这种校园精神的亵渎，对于大学的文化建设，人文学科将起到实在的主导作用。

我最近提出了一个“全球人文”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打破狭隘孤立的民族主义的“自我欣赏”和“自满自足”，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出狭隘的学科领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探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话题。“人文”在这里实际上带有这样两层含义：其一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包括信仰、伦理道德和文化修养，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乃至丧失，指的正是人的伦理道德的丧失以及信仰的缺失；其二则指的是相对于高等院校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学科而言的另一些注重“人的研究”的学科，即所谓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为什么能够对一些前沿学术理论话题敏感而迅速地作出自己的反应？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人文学者主要研究对象是人，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特别是精神生活的环境，因此当他们的生存环境、精神领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他们就很容易率先感受到、并出于本能地作出自己的反应；其二，由于人文学者更加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常常愿意花上很多时间去读一些与自己的专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却直接关涉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书籍，很容易敏锐地觉察到整个学界、整个社会当下所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并及时地作出自己的反应；其三，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大多擅长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实际思考未见成熟的想法写成文章并见诸报刊，引起争鸣和关注。

当然，人文学者的跨学科特征既是其长处，同时也是其短处：人文学者往往知识面宽广，敢于涉足其他学科领域，并及时地发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也正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跨学科特征，往往也容易粗浅地涉猎其他学科领域，甚至发表的见解流于浅薄，常常在华丽的理论辞藻背后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的支撑。

有鉴于此，人文学科的评价也是最困难的。在当前的国际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可以用影响因子来衡量一个刊物的影响力，以一篇论文的被引次数来判断该论文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之于人文学科的刊物，则很难用类似的标准在很短的时间内判断一个刊物或一篇文章的影响力，尤其对那些专业性很强但又十分冷僻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就更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对此，我提出了定量和定性结合的评价方式，即在考察一个学者著述的数量同时，看看他的被引次数，这样结合起来看就能相对客观得出对一个学者的准

确评价。

人文学科的作用

作为人文学者，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提问：你们文科的教授也从事科研吗？那么文科究竟研究什么东西呢？我的回答是，文科从事的并非是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研究，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人文学术研究以及思想的研究。所以一般说来，人文学者并不需要偌大的实验室和昂贵的仪器设备，但他们必须有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可以静心思考和写作的环境，此外还得有一个可与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人文学者或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对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那样，对前人的成果是淘汰制和绝对的超越，而同时体现在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即使是某些全新的假想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结论的批判性超越或扬弃之基础上的。这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诚然，关于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中外学者已作过论述，其中必然涉及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文科的评价问题，说的更具体一些，也即关于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如上所述，评价人文学科的成果，决不能简单地以数量来衡量，也不能仅以该成果发表在何种刊物上来衡量，更不能绝对地以某项成果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来作为是否有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文科的评价标准究竟何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已有的人文学术做了多大的发展和推进，因为人文学术的素养往往在于深厚的积淀。有些公认的人文学术大师，生前也许并不为当时的学界所青睐，死后才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有些人甚至去世多年，但他们的影响却丝毫没有因此而衰落，反倒是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他们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因而产生持久的影响。这可以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锺书、朱光潜等近现代人文学术大师在今天的文献中的被引次数和持久影响力中见出。当然，与此相反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第二，是文科的风险问题，这也是许多大学在发展文科时谨小慎微的一个原因。既然人文学科所要探讨的往往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问题，那就势必要冒一些风险，这其中既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颠覆性批判和超越，同时又包括一些在我们看来“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话题的研究，如果冒犯前者就会受到学界的诛伐，而冒犯后者则有可能遭到查禁。因此，在人文学者看来，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特别是对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更应该做到大胆探索、小心立论，这样我们就能够推进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那么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另文专述，我这里仅略述一二。首先，如前所述，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内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更是如此，这也就是耶鲁大学的文学学科始终在全美大学分科排名中名列文学学科前茅的原因所在，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大学总是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延揽一流人才以充实其师资队伍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两所大学的人文学科确实为它们的声名增光，使其无愧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称号。其二，人文学科除了发展自身的学科外，还可以在所在的大学校园里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促进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交锋，正是在这样的交流和交锋中，新的思想和成果才能产生，新的大师才能脱颖而出。其三，设在大学里的人文学科还服务于整个社会，不仅向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还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修养，巩固人们的信仰，从而使人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的五百强企业如此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管理思想在当今时代如此受到管理者青睐的原因。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虚”有可能转变为“实”，进而直接服务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

走向一种“全球人文”

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还应该有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正是基于此，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人文学科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和波及，在文学界，世界文学这个话题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并成为新世纪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在语言学界，针对全球化对全球英语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我本人也提出了复数的“全球汉语”之概念，并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语言体系将得到重新建构；在哲学界，一些有着探讨普世问题并试图建立新的研究范式的抱负的哲学家也效法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世界哲学”这个话题，并力主中国哲学应在建立这一学科的过程中发挥奠基性作用；而一向在被认为是最为传统的史学界，则早有学者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通史的编撰等领域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是非常及时的，而且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也确实就这个话题有话可说，并能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其次，既然“全球人文”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人们不禁

要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难道它是世界各国文史哲等学科简单的相加吗？我认为并非如此简单。就好比世界文学绝非各民族文学的简单相加那样，它必定有一个评价和选取的标准。全球人文也是如此，它所要探讨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应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且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文学者的抱负和使命。一些西方的二、三流汉学家的著作都可以在中国见到中译本，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一流人文学者的著作都没有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只有极少数可以直接用英文著述的优秀的中国人文学者在经过严格的评审和多次修改之后才勉强地跻身国际学界，但发出的声音却是十分微弱的。这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语言的障碍，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们所提出的话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传播媒介无效或传播途径不畅，那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难以走向世界。

全球人文所探讨的既然是全世界的人文学者都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那么表达的媒介自然是相当重要的。当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文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应该是中国的哲学“登场”了，中国的人文学者不仅要在中国研究领域掌握话语权，同时也要在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基本理论话题的研究方面争得最起码的话语权。由此看来，全球人文的实施可谓任重道远。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应该不负众望，为全球人文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大学的人文学科教师，我们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培养人才。我认为，对于一个优秀的文科教师来说，他不应该仅仅指望把一个已经显露出很有才华的学生毫不费力地“培养”成才，更不能依赖学生来替自己产出科研成果，而更应该在一大群学生中发现某个具有学术潜力、但暂时还没有什么成果的青年学生，精心尽力地将其培养成著述甚丰的学术新秀。这正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培养人才模式的差别。我自己在三十多年的高校教学生涯中一直力图以此来鞭策自己。

学者小传

王宁，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致远讲席教授，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入选教育部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为国际SSCI或A&HCI权威期刊*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主编之一，*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ca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Cul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编委，*Neohelicon*顾问。并任国(境)内外二十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或客座教授。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先后应邀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和澳洲三十多个国家以及港台的八十多所大学访问讲学或从事学术研究。

作为中国当代最早从事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王宁在这几个领域内被公认为是国内学者中著述甚丰且影响最大者之一，并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主要创始人，王宁于2000年和亚、欧、美、澳等地学者共同创办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并在中国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文学理论大会，为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得到国际认可

作出了突出贡献。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和清华大学领衔成功地申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并分别把这两个学科建设成北京市重点学科。

(本文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供稿)

四、院所探访

北大文研院：守护学术的宁静与安然

2017年12月26日下午4:00，静园二院111会议室的长条桌边坐着11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他们像老朋友一样面对面聊天，分享过去四个月的经历与收获。9月，他们作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第三期邀访学者，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介绍各自的研究方向和计划。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每周都会在这里进行一次内部报告会。这一天，他们最后一次聚在这间会议室里，回顾各自的研究成果，而他们为期四个月的邀访学者项目也画上了句号。

学术净土

燕南园以西，灰色的院墙将静园和主教学区隔离开来。不同于教学楼前人来人往的喧闹，灰瓦红墙的静园二院安静地伫立在这里。二院门口，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门牌掩映在树阴之中。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直接隶属于北京大学，是以人文与社会科学等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实体学术机构。2016年9月，文研院揭牌成立，到今年已经走过了一年有余。孙圣民在2017年9月来到静园二院，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批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他们自主申请并通过考核后来到北大，进行为期四个月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访问学者们居住在勺园，并在静园二院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全北大的资源都向他们敞开。

“方便”是这位来自山东大学、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对文研院最直观的感受：“每天基本上都在自由地看书和写作，住在校内没有什么交通成本，办公室、食堂和公寓之间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胡鸿是和孙圣民同一批前来的学者。和许多青年教师一样，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任教时，胡鸿平均每周要上三节课，其中包括许多第一次开设的新课程。备课占用了他的绝大多数时间，拥有完整的时段坐下来研究他感兴趣的课题成为奢侈的事。此外，武大历史学院的新办公楼在 2017 年末才启用，此前教师们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完成当天的授课后就“无处可去”。

“在文研院就很不一样，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随意安排自己的活动，要去图书馆和各个院系也很容易。”胡鸿说。

在国内已经有若干高校相继成立各类高等研究院的情况下，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对文研院有更独特的期望。“北大是一个做事情总会比其他地方要‘慢’一点的地方。”文研院工作委员会成员陆扬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于 2017 年 3 月来到文研院，在这里度过了四个月的“驻院生活”。在他看来，文研院没有项目课题式的紧迫要求，也不认“官儿大学问就大”的道理，它所提供的宽松和谐的研究氛围“新鲜又奢侈”。“躲”进静园二院的四个月里，许宏得以闹中取静，心无旁骛地想问题、写东西。2017 年 5 月，他在文研院完成了已思考二十余年、动笔两年多的作品《先秦城邑考古（7000-221BC）》的初步写作，此外还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这三篇重要作品，成为他学术生命的重要节点。

激活思想

每周二的中午，文研院的访学者都会聚集在一起进行午餐会，午餐会结束后是内部报告会。在报告会上，学者会以幻灯片和演讲的形式汇报自己目前的研究课题和进展，其他学者则在报告人讲完后对其报告内容提出看法和建议，甚至是直接的批评。

“学者相互之间会有很多的交锋。”文研院行政团队的成员关雪说，“他们会说你的观点在我的领域里其实已经做过了，或者这个研究的本质问题其实就是另一个已有的问题。”孙圣民记得，在一场报告会上，一个社会学教授的报告内容涉及到了部分人文学科的知识，当时在场的几位历史学学者立刻提出了一些很专业的建议，例如如何筛选历史文献、其中哪些文献不必引用、更深入的文献应该去哪里搜索等。“我觉得特别好，”孙圣民说，“因为我们在社会科学内部很

难接触到这么专业的人文学科的知识，也很难得找到这样的高手。这是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沟通渠道。”

2017年秋季学期来到文研院的邀访学者中，有来自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七位青年学者和五位教授。文研院提供的安静环境和宽松制度让他们能够深入进行独立研究；而内部报告会的平台让他们可以随时向其他学者请教与自己的课题有关的问题，激发彼此的灵感。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也参加了本期的邀访学者项目。和文研院里的诸多中青年学者相比，现已退休的邓淑苹是考古和历史学领域里的资深前辈。2017年10月17日，邓淑苹以“何以‘万国玉帛’——探龙山、二里头时期玉文化的形成与意义”为主题展开报告。报告内容偏重上古时期的历史，对大多数邀访学者来说，这是一个较为陌生的话题。“大家提出了很多不同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问题我自己也不一定能想到。”邓淑苹说。

邀访学者在文研院驻访的四个月期间可以自由参加文研院举办的学术活动，也可以充分利用北大的资源完成自己的课题。邓淑苹就受邀为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们讲解玉器的知识；她也利用这个机会，去听北京大学或中国人民大学她所感兴趣的课程。比如“北方民族考古”这门课，因为老一辈学者的故去，在台湾已经没有学人能够讲授。

胡鸿在这四个月中听了很多讲座，讲座的主题不一定都与他的研究直接相关，但总能激发他的灵感。“不能指望人家讲的就是你所研究的这个课题，那这样你就不用研究了。很多时候是一个思维方法上的刺激，会让你得到不少灵感，既有知识上的扩充，也能给你方法和智慧上的享受。”作为青年教师的胡鸿对当前学者面临的压力感触很深：“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焦虑状态：你一年发两篇文章，别人一年发了四篇；你一年做了两个项目，别人手上有五个项目。无形中就会存在一种竞争现象，甚至和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差不多。”

在这样的潮流中，文研院希望回归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在人人争当“发文机器”的时代里，给学者宝贵的清净和空闲。人文社会研究的常态往往是较为隐秘的，研究者也习惯于独立发现问题再进行深入钻研。相比于自然科学中团队合作的“兵团式”作战，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灵感在独立思考时更容易出现。“文研院的存在，为人文社科学者心无旁骛地进行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可能性。”韩笑说。

“做学者该做的事”

“做学问这件事本身，是慢不是快，学问也不是用量化标准来要求的。”北

京大学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说。

文研院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围绕着学者个体思考的自然过程进行的。当国内学术界争相攀比发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蔚然成风时，北大文研院更像是学术大潮中的“逆行者”。

对邀访学者不设置成果考核的制度是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和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共同商议的结果。渠敬东认为，优秀的学者从来不会偷懒，常规性制度是为大多数人设计的，而文研院的特殊制度则是为优秀学者量身设计的。

“我们鼓励学者们去做的是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去拓展学科边界。创造性的活动是不需要规定的，哪怕他们歇一歇，都可能是为下一步的创新在做准备。”

文研院成立时，林建华对文研院的嘱托是“让学者做学者该做的事”，这其中也包括学术传统的延续、学术史的重温、学人档案的整理与收集。基于这种关怀，文研院在组织讲座、论坛、读书会、工作坊等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之外，也举办了众多专题展览活动，比如千年敦煌艺术展、“蔡元培与北大”展览、“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纪念展”等。文研院还会组织邀访学者一同去国家图书馆古籍室、荣宝斋等地参观学习，将学术带入实践之中。

在这一年半里，北大文研院已经开展了三期邀访学者项目，共邀请了56名国内外学者驻访。在驻访过的学者中，陆续有人的学术成绩获得来自官方、民间评价体系的奖励或肯定。“离开文研院后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学者比例很高，这说明我们的方向和判断是没有错的。”陆扬说。

孙圣民笑着说，在文研院的四个月里长了许多白头发，但身材恢复到了年青时的模样：“每天的生活都是宿舍、办公室、食堂三点一线，每周休息一天，午饭和晚饭后在未名湖边散步聊天，学术和健康方面都收获良多。”邓淑苹则表示，在文研院结交了很多学术界的朋友。除此之外，在每周给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讲解关于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她也将资料做了更全面的梳理。

在渠敬东看来，尽管文研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要走的路依然很漫长。“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帮助其实还可以做得更深入，我们对青年学者的帮助主要还停留在提供机会的阶段，但是在他们学术生命最关键的时期我们所提供的建议和经验还不够。”

将来，文研院会在现有的邀访学者制度上加强跨学科的交流 and 与国外学者的交流，通过和国外的高等学术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平台来进一步完善自身。

(本文引自于搜狐网特稿，网址 http://www.sohu.com/a/215109950_176400)

五、海外传真

CHCI 简介、项目、论点及 2018 年会

CHCI (Consortium of Humanities Centers and Institutes, 国际人文中心和研究所联盟) 于 1988 年成立, 是讨论培养跨学科活动以及传播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的相关问题并彼此共享资源的网上联盟。联盟的成员包括 150 家以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所, 而且它们的大小和研究领域都相当多元。联盟的成员来自许多地方, 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韩国、芬兰、中国台湾、爱尔兰、英国等等。总部设在美国杜克大学。

目前港台地区参加该中心的学校有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 中国大陆地区参加该中心的只有南京大学高研院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CHCI 关注的领域具有全球性视野, 比如 2013 年在安德鲁·梅龙基金会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的支持下, CHCI 开展了以下四个领域的专题研究: 1、宗教, 世俗主义和政治归属; 2、环境人文; 3、CHCI 医疗人文网络计划; 4、综合研究生人文教育研究与培训。还有今近年来他们关注的“非洲人文科学地图 (African Humanities Map)”项目, 通过了解和记录整个非洲大陆 (特别是南非以外) 的人文中心和研究所的活动, 以及分享相关具有类似功能的大学、研究团体、文化组织、期刊、出版社、博物馆或画廊等的人文学术与科研成果, 以支持学者跨学科交叉或学术界与非学术界的交流的方式, 包括活动家、艺术界正活动, 来勾画对于非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情况的面貌。

CHCI 会经常发布知名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研究的热点议论, 比如 2017 年他们关注的论点有: “宗教与世俗主义 Religion and Secularism”、“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 Civil Religion in Chinese History”、“信仰 Faith”、“原教旨主义 Fundamentalism”、“科学 Science”等, 以及最新的“何为人文研究值得资助? Why Fund Humanities Research?”。

CHCI 每年举行年会, 2017 年的年会由南非西开普敦大学举办, 主题为“即兴的人文 (The Humanities Improvised)”, 本次会议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联盟成员、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和人文主义者, 他们讨论了瞬息万变的世界背景下,

人文学科自我定位，重新概括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关系。2018 年的年会将于 6 月 13 日-17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举行，主题为“人文情报 Humanities Informatics”。（链接 <https://chcnetwork.org/2018-annual-meeting>）

UBIAS 简况及近年的“年度主题”

UBIAS（全球大学高研院联盟）创建于 2010 年，当时来自全球 32 个研究机构的代表在德国弗赖堡大学高级研究院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大学研究院：承诺，挑战，新领域”会议上齐聚。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多所大学不断创建高研院这样的机构，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与传统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不同的是，UBIAS 是以大学为基础的学术机构联盟，为本国大学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成就做出积极贡献。UBIAS 总部在 2010-2016 年设于德国弗莱堡大学，从 2016 年起，总部转设于挪威奥胡斯大学。

目前会员单位已经发展到 37 个成员单位，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成员有 3 家，是南京大学高研院，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台湾地区的成员是台湾大学高研院，日本的成员是名古屋大学高研院和早稻田大学高研院。

UBIAS 研究所通过提供不同学术水平的各种奖学金计划（初级和高级研究人员），汇聚了来自不同学科，民族和学术背景的优秀研究人员，为创新研究创造了一个富有成效的环境。这些共同的特点已被证明是相互交流的富有成效的基础，尽管各个研究所展示了各种不同的概念和学术追求。用他们的个人资料，他们回答他们的附属大学的具体需求和优势。虽然许多研究机构传统上集中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将理论和实验科学结合在一起。

UBIAS 借助每年一次的年会、两年一次的院长会议，以及伙伴机构间的联合计划保持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学术联系。目前院长会议已于 2010 年（德国弗莱堡大学）、2013 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2014 年（台湾大学），2016 年（英国伯明翰大学）举办过四届，2018 年的院长会议，将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举行。2017 年，UBIAS 年会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高研院那举行，主题是“Today’s IAR/ IAS Chanlleges - Future Perspective(I)”。

UBIAS 有一项非常有趣的联合计划机制是“年度主题（Topic of the year）”，该主题由各成员单位自主申报，经过评选后确立。随后，UBIAS 和各成员单位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一系列的学术科研活动。比如，2015 年的年度主题是“时间”，2016 年的主题是“媒体与数据控制（Media and Data Control）”，2017 年的主题是“恐惧（Fear）”。2018 年的年度主题是“老龄化(Aging)。”